

Jiangnan Shizhen
Lüyou Wenhua Yanjiu

江南市镇旅游文化研究

李海平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江南市镇旅游文化研究

李海平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市镇旅游文化研究. / 李海平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308-05871-1

I. 江… II. 李… III. 旅游—文化—华东地区 IV.
F59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084 号

江南市镇旅游文化研究

李海平 著

责任编辑 周卫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20 千字

版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05871-1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第一章 江南古镇旅游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

- 一、文化与旅游的基本概念及其关系/3
- 二、江南六大古镇旅游文化的界定/13
- 三、江南六大古镇旅游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
- 四、江南六大古镇旅游文化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23

第二章 吴文化——江南水乡六大古镇文化之根/28

- 一、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人文地理环境/28
- 二、江南水乡六大古镇文化渊源与变迁/37
- 三、吴文化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文化的主要形式/42

第三章 水文化——江南水乡六大古镇文化之魂/52

- 一、水文化的内涵/52
- 二、江南水乡古镇水文化的一般特征/56
- 三、缫丝养蚕和民俗文化是江南水乡古镇水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62
- 四、江南水乡古镇人文精神之分析/87

第四章 江南私家园林文化探析/121

- 一、江南古典园林文化的发展历程/121
- 二、江南古典园林建筑中构景要素的艺术特色/125
- 三、江南古典园林建筑中构景手法的不同风格/129

四、江南古镇私家园林赏析/133

第五章 江南水乡古镇生态环境对比研究/147

一、生态旅游概述/147

二、江南水乡古镇生态环境与旅游资源赋存状况/150

三、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64

四、江南古镇生态环境保护与持续利用机制/168

五、江南水乡古镇可持续发展策略思考/170

六、结语/176

第六章 江南市镇饮食文化的特征及其开发思路/177

一、饮食文化概述/177

二、江南市镇饮食文化的特征/180

三、江南市镇饮食文化开发现状分析/193

四、江南市镇饮食文化开发思路/197

五、结语/202

第七章 江浙藏书与藏书楼文化探究/203

一、藏书与藏书楼概述/203

二、江浙藏书与藏书楼文化的背景/205

三、江浙藏书得天独厚的文化特点/207

四、江浙藏书与藏书文化创新之处/214

五、江浙藏书家的藏书取向转变/217

六、江浙藏书楼与江浙旅游的关系/222

七、江浙藏书家的兴衰史——以南浔古镇刘承干的
藏书为例/230

第八章 旅游文化教育与旅游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探索/243

一、旅游专业教育若干问题探讨/243

二、高职旅游文化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259

三、高职旅游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探索/266

主要参考书目/277

后记/281

第一章

江南古镇旅游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市,古已有之。早期就有“以井为市”的说法,通常是指聚落之间产品交换的场所。在城市中,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即所谓州市。在州县以外的地方出现的“市”,被称为“草市”。集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的。集市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市镇。^①近年来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相当活跃,研究成果也极为丰硕,尤其是有关明清时期的市镇经济与发展问题。但对何谓明清时期“市镇”这个基本概念问题,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比如全汉升从西欧市场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市”的最初含义应是公认定期大市(Fair)或公认定期常市(Market)。^②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须以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和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③刘石吉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市镇,主要是见之于明清方志所载的“市”与“镇”,有别于一般的通都大邑以及其他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在明清方志中,“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

①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1 页。

② 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 年 1 卷第 2 期。

③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275 页。

业聚落的通称。^① 邓亦兵在界定清代前期的市镇时,以两个要素为参照: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她仔细甄别了市镇与省、府、州、县各级城市以及集、市、墟、场、店的异同之处,认为从市镇的城墙、四栅,市镇外围方圆的面积,市镇之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镇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商品种类等方面看,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一种趋于城市化的倾向。^② 许多学者承认,市的名称各地不一,北方称集,两广、福建称墟,川黔称场,江西称圩,湖广称市,江南则将具有相当规模的市称为镇。显然,南浔、周庄、乌镇、同里、西塘、角直属市镇范畴,由于历史悠久,所以,人们称之为“江南古镇”了。

江南六大古镇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极为丰富。长期以来,由于生活在拥挤嘈杂都市里的人们渴望回归自然,享受乡镇风情,所以,水乡古镇旅游也就应运而生并迅速地蔓延和发展起来。游客为古镇的“小桥、流水、人家”而迷恋,为清淳幽静、处处可画、时时有诗的风情而陶醉。人们以怀旧的心态对待她们,十分依恋而备加珍惜,这种怀旧和珍惜主要是对古镇历史的回顾、尊重和思考,这或许是中外学者历经几十年的研究而长久之不衰的原因吧!

江南市镇旅游研究确实是 20 世纪后期中国旅游学研究中最值得讨论的领域之一。1984 年,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以周庄古镇双桥为主题的油画作品《故乡的回忆》问世后,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水乡周庄迅速蜚声海内外。从而

①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上),《食货》1978 年 8 卷第 6 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 年 16 卷第 2 期。

②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以周庄为代表的一批江南古镇陆续走上了以旅游开发为先导、带动各行各业全面发展的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地方性经济和文化现象,江南六镇于2001年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且被正式列入预备清单,2003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从2001年开始逐渐成为江南地区的一大旅游热点。六镇旅游的兴盛促进了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并为古镇居民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①目前,古镇旅游作为一种极好的休闲旅游方式已经得到了蓬勃发展,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对有关古镇旅游也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文化与旅游的基本概念及其关系

文化与旅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语,然而对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旅游?”这样的问题,人们却很少去思考,认为这是学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情况确实如此。事实上这也是学术界长期探讨和争论的课题,本文也不例外。在探讨江南六大古镇旅游文化的含义、特征、范围之前,有必要对文化、旅游及其关系作必要的阐述。

关于“文化是什么”,古今中外在理解和表述上差异较大。中国“文化”一词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周礼·正义》卷三曰:“关乎人文以化天下。”这是“文化”一词见于典籍的开始。《易·贲卦》中有“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句,这里的“天文”应理解为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规律,这里的“人文”应理解为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

^① 王云才:《江南六镇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及持续利用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3期。

行为或行为规范。西汉以后,古典文献中正式出现“文化”一词,刘向的《说苑·指武》中有“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句;晋束皙的《补亡诗》中也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诗句。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与“武力治理”相对应的“文治与教化”。《辞源》对“文化”的解释就是“文治与教化”。可见,中国古代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范围也较窄。主要是指统治阶层对国家的非武力的治理与对民众思想道德及行为的教育和感化。而古代西方“文化”一词无论是德文的“Kultur”,还是英文的“Culture”,都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其原义是土地的耕耘和作物的栽培;居住和练习;关注和敬神等。其词意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宗教的关系。之后,与古代西方人从认识自然转向认识自我的逻辑转折相适应,“Culture”一词融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即向精神领域拓展,也就是说“文化”一词在原义的基础上又包含了诸如教育、尊重、培养、发展等内容。到了17~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用以指人类智慧、情操、社会风尚等,其意与“education”十分相近。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在《原始文化》(1871年出版)一书中指出:“所谓文化或文明,从广义人类学意义上看,是由知识、信念、艺术、伦理、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所构成的综合体。”显然,这一“文化”定义与原义差异很大,主要侧重于对精神世界的诠释。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文化”一词的词义都产生了衍变和扩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腾飞,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化和旅游文化的热潮。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领域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据不完全统计,给“文化”下的定义达260多种。

我国学者张文祥在其主编的《旅游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不同定义进行了分类和归并,认为从狭义到广义大体可以排出如下序列:其一,“文化”泛指一般的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如识字不多要学“文化”,言行粗俗要提高“文化”素养,知识丰富的人“文化”水平高等。这是对文化最狭义的也是最通俗的理解。其二,将“文化”与教育、学术相并列和区别,专指艺术、文博、图书等部门和工作,即文化部及其下属机构主管的“文化”,其范围虽然较上述“文化”含义广,但仍属狭义的理解。其三,将“文化”的定义扩展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特指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哲学、道德、民俗风尚等精神方面的创造与成果,与政治、经济、军事相并列和区别。其四,“文化”最为广义的定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上述分类和归并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三种为狭义的文化定义,第四种是文化的广义定义。再如韦燕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旅游文化》中认为:“文化应当是指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民族或地域特色的语言文字、思维特征、社会心理、传统道德、法律精神、宗教信仰、艺术风格、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精神与物质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及其表现。”

可见,人类对“文化”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或者说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之间的关系”→“人自身的心理关系”的转变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广义的“文化”定义应该是个包罗万象的大概念。如果我们将它看作是个动态的系统的话,那么,“文化”的结构应该由三个层面组成:即第一是最外层的物质层,主要是指人类创造的劳动成果;第二是处于中间层次的思想、制度层,它包括隐藏在文化物质层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精神产品和各

类制度、行为规范等;第三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人的心理层,主要包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等。由于“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所以,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志对其进行分类。比如从世界区域不同来划分,可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等;从宗教类型的不同来划分,可以分为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文化等;从人类行为类型的不同来划分,可以分为乡村文化、城市文化、饮食文化、企业文化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的一些基本属性: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是人类的创造物而非自然物。比如人类创造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文艺作品、工艺美术品等。其次,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所以是为社会所普遍具有和享用的、不是属于个人的。再次,文化是由人类的智慧和劳动所创造的,这种创造体现在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中,体现在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

“旅游”一词在我国出现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了。早在南朝梁代时,诗人沈约(441—513年)就写有《悲哉行》诗歌,诗云:“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嚶起稚叶,蕙气动初蘋。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这是迄今为止中文最早的有关“旅游”一词的出处。到了唐代以后,“旅游”一词开始被广泛运用。比如唐初王勃在《涧底寒松》中说:“岁八月壬子,旅游于蜀,寻茅溪之涧。”韦应物在《送姚孙还河中》诗中写道:“上国旅游罢,故园生事微。风尘满路起,行人何时归。”张籍的《岭表逢故人》中有“过岭万余里,旅游经此稀。相逢去家远,共说几时归”之句。白居易的《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中也有:“江海飘飘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再如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在他的《杂著》中也提到了“旅游”一词:“东园公初晋七帙,言开曼

龄,是日高晏……会有京华旅游淮海浪士,闻之欢喜”等。可见,自南朝起我国历代文献中就有“旅游”这一词汇了。但其含义相对较窄,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赋予“旅游”概念更深、更广泛的含义。

旅游,顾名思义,包括旅行和游览两种行为。瑞士学者汉泽克尔和克拉普夫对旅游所下的定义是:“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一般将它解释为:个人或团体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到他乡异国去从事吃、住、玩、购等活动,以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要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交道。比如使用旅游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目的地观赏名胜古迹、体验风俗人情、购买各种纪念品、与当地居民进行思想交流等。因此,旅游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经济性三个属性。其中,文化性是旅游活动最根本的属性。“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系统,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旅游者这一旅游主体借助旅游媒介等外部条件,通过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动,为实现自身某种需要而作的非定居的旅行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①可见,旅游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一个内容。旅游与文化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中国旅游史的起源与发展来看,旅游与文化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170万年前我国云南元谋县那蚌村已有“元谋人”的活动“游踪”。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以后,才完成了从猿到人的演变,人们学会了制作粗糙的工具与自然抗争。距今约100万年到30万年,在我国的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湖

① 沈祖祥:《旅游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构想》,《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

北郎县、安徽和县、贵州黔西、辽宁营口等地都已发现生活着创造旧石器初期文化的古人类。他们创造的早期文化有着明显的共性。比如过着群居的生活,以采摘果实、狩猎为生,能使用简单的石器工具等,其中以北京猿人为这一文化的代表。距今约 30 万年到 1 万年,我国又先后出现了旧石器中期文化和旧石器晚期文化。尤其是晚期的古人类已经基本接近现代人,考古工作者几乎在全国各省都发现了这类文化遗址(或遗迹)。《中国古人类画集·前言》中指出:“我国境内已知各阶段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有许多共同点,有鲜明的继承性。各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有铲形门齿,石器以单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多,兼有尖形器和砍器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最初缔造者,并在“游移”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和继承。距今约 7000 年到 4000 多年我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开始了早期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已从完全地依赖自然赋予的采集经济过渡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出现了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纺织术和磨制石器。社会结构也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在新石器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阶级也由此而萌生。从全国各地 7000 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或遗迹)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当时的文明程度。我们不妨以长江下游为例,了解一下以太湖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吧。

河姆渡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因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而得名。发现于 1973 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距宁波市约 20 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遗址总面积达 4 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 7000 年前。通

过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水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 6700 余件,为研究农业、畜牧、建筑、纺织、艺术等学科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 7000 多年前,就已经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史前文明。河姆渡遗址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特征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地域特色。遗址中发现的稻米,经鉴定,主要是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上“有籼无粳”的空白,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伴随出土的代表性农具是骨耜。稻谷和骨耜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在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遗址发掘中,到处可见数量众多的木桩及木构件,据考证为“干栏式”建筑遗迹。这种既可防潮又能防止野兽侵袭的“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尤其是榫卯技术的运用,把中国榫卯技术的历史推前了 2000 多年,被考古学家称之为 7000 年前的奇迹。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残骸与七只木制船桨,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遗址中的木构浅水井遗迹,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

马家浜文化 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的新石器中期文化,因嘉兴马家浜遗址首先发掘而得名,距今约 5000—6000 年。马家浜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南至钱塘江,西抵茅山,北边可达长江北岸一带,浙江桐乡罗家角、海宁彭城和吴兴邱城等遗址都属马家浜文化类型。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相比,具有自己的风格和杭嘉湖平原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一是居址与葬地分开,盛行俯身葬;二是陶器以红陶为主,以手制为

多;三是开始以玉器为装饰品。农业生产已成为马家浜文化定居生活的基础,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还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马家浜文化已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从而确定了它在史前考古中的地位。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余杭良渚镇遗址首先发掘并具有代表性而得名,距今5300—4000年。遗址主要广泛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熟一带,而以钱嘉湖平原较为密集。在浙江境内的重点遗址除余杭、安溪、瓶窑三镇外,还有杭州水田畈、湖州钱山漾等代表性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稻谷、玉器、刻纹黑陶、丝麻织品、竹编器物等,显示长江三角洲原始社会末期的高度发展的文化水平。农业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种类繁多,磨制精致。石犁的使用,表明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已从“刀耕火种”的锄耕阶段进入了犁耕阶段。出土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器表的装饰多素面,打磨光亮,少数有精细的刻花和镂孔纹饰,或彩绘。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的是玉器,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制作之精,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开创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先河。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残绢片和丝麻织品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丝、麻织品,证明了湖州是世界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良渚文化以全世界最精美的玉器、石器所表征的礼制,连续作业之犁耕生产方式,大型工程营建,大规模社会生产组织系统,早期科学技术思想以及丝织、黑陶、髹漆、木器等手工业抑或商业的萌生而著称,是中国文明的前奏,是夏、商、周文明的主要构成因素,在学术界素有“文明曙光”之誉。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

最具规模和水平的遗址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①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时发展的还有许多文化。比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活跃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等等。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创造了不朽的文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了我国远古时代实际上存在过许多创造不同文化的民族和若干部落集团。由于当时没有文字,所以缺乏史料记载,只留下了一些生动的神话传说。现代学者认为:中国远古时代曾存在过诸如由黄帝、炎帝等领导的,活跃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华夏集团;由太昊、少昊等领导的,活跃于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的东夷集团;由三苗、伏羲、女娲等领导的,活跃于今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苗蛮集团等等。这些部落集团经过长期的旅游、交往、斗争等活动最终融合为华夏民族。在众多神话和传说中,有不少是关于远古时期领袖人物旅游活动的。例如华夏始祖黄帝是位云游天下的旅行家,《史记》中记载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河。迁徙往来无常处”。颛顼是继黄帝后又一个伟大的首领,他也是一位大旅行家。《大戴礼记》中说他“乘龙而至四海”。《史记》中说他“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河,东至于蟠木”。舜是巡狩旅行的首创者,据《尚书》记载,从舜开始,帝王们要按照制度五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巡狩旅行,诸侯一年要作一次朝覲旅行。而大禹是治水英雄,但也是“入乡随俗”旅行家。春秋战国

^① 蔡敏华,李海平,包锦阳:《浙江旅游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